

## 《大跃进运动时期刘少奇的心路历程》

迄今为止，我国学术界对于大跃进运动研究比较多，但是人们几乎均是对事件的叙述或对“左”倾错误的反思，而对中央一些领导者的心理分析付诸阙如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我国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，提前完成了“一五”计划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，这也使一些中央领导人滋长了骄傲自满、急于求成的情绪。

1958年刘少奇说，“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，没有料到水利生产运动发展得这样快。是否可以再快一点，还是有可能的”。提醒反冒进的人，“‘慢性病’的损失不亚于‘急性病’，现在右倾危险还是主要的。”并认为过去拟定的计划指标太低了，需要大大修改，超过英国已不需要15年，估计10年时间就可赶上。（[1]刘崇文，陈绍畴。刘少奇年谱（下）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6，420—421页）

刘少奇心中还激荡着急于求成的情绪，认为“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，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”，“还吹空想社会主义，还吹托儿所，集体化，生活集体化，还吹工厂办学校，学校办工厂，半工半读等”，对未来社会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大胆设想。一个“吹”字形象地表露出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的乐观心态。他告诉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，“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，你们可以试验一下。”（[2]薄一波，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（下）北京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1993，732页）河南省很快就成立了托儿所、公共食堂等，人民公社轮廓逐渐显现出来。

5月，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，刘少奇热情地赞扬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经历着“一天等于二十年”的伟大飞跃发展时代，“需要大批敢想敢革命敢做的人，敢于破除迷信，革新创造的人……依靠这样的人，我们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，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”，再次强调“建设速度的问题，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。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。”（[3]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（第11册）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5，323页）还提出了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等构想，要求北京和天津试验。会后，刘少奇进一步探索农业社发展问题，“农业社不能单搞一门，要多种多样地全面发展”，可以搞工业，多办一些地方性的小工厂；可以搞商业——社会主义的商业，把信用社、供销社、农业社联合起来；还可以搞教育，文盲帽子都要摘掉，儿童都要上学，还要搞体育等，“总之，就是工农商学兵都要发展”。（[4]幸福的夜晚，难忘的会见，人民日报，1958-7-30）

在对大跃进运动过于乐观的情绪下，刘少奇还一度相信了浮夸风。如7月中旬，他在山东省参观了号称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玉米、谷子和30万斤地瓜以及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田后，赞扬道：“你们压倒了科学家，他们没敢想的，你们做了，这是个革命。”（[5]赵士刚，共和国经济风云，北京：经济管理出版社，1997，467页）轻信浮夸风也使他对“超英赶美”的计划更加乐观，“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，二年三年就行了。十五年是赶上美国的

问题。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，七八年就行了”。（[6]金冲及，刘少奇传（下，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8，832页）甚至具体规定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间表，从“1963年开始，住房子、穿衣服都可以做到‘各取所需’，这就是共产主义！”（[7]吕星斗，刘少奇和他的事业，北京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，1991，367页）并要求立即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进行试验。当时，河北省徐水县是农田水利建设的典型，在全国影响很大，他指示“在徐水搞一下试点，搞共产主义，搞工、农、兵、学、商结为一体，在农村、机关、学校都搞”。（[8]赵云山，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概述，河北党史资料（内部发行）（第十五辑），1994，10页）于是，徐水县进行了4个月共产主义试点，但是以失败而告终，在全国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。

8月中下旬，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，刘少奇怀着“惊奇和兴奋，似乎一切都是顺利的”愉悦心情参加了会议。（[9]刘崇文，陈绍畴。刘少奇年谱（下）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6，475页）大会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、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，认为这是“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”，“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，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”。（[10]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，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（下）北京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1981，72页）其中就包含了刘少奇先前许多设想。在会上，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的热情达到顶点，提出“要依靠贫农、下中农，充分发动群众，开展鸣放辩论，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、转公社的上中农，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，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，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”。（[11]薄一波，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（下）北京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1993，745-746页）这既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，也为共产风、干部强迫命令风等“左”倾错误打开了方便之门。

总之，这个时期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非常“惊奇和兴奋”，认为找到了一条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捷径，这不仅钝化了他实事求是的敏感度，也为大跃进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1958年10月人民公社普遍建立后，他号召尽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，把“国家的仓库、商店、银行、加工工厂、学校都交给公社，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……这样做两三年后，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。”（[12]刘崇文，陈绍畴。刘少奇年谱（下）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6，440页）后来又主张趁穷过渡，“达到150—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，将来分批转，这样有利，否则，等到更高了，转起来困难多，反而不利。”（[13]李锐，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，中共党史资料（总61期），1997，56页）

1959年2月，他在一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还为大跃进运动进行辩解，“去年的‘大跃进’，是全面的大跃进”，其“缺点就是对有些东西的生产注意不够或没有注意，因而引起经济上某些方面的失调。缺点是应该承认的，也可以指出来，但过分责备便没有必要，”只要纠正了这些缺点错误，事情就会越做越好。（[14]刘崇文，陈绍畴。刘少奇年谱（下）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6，448页）

庐山会议后，他公开撰文为大跃进运动辩护，指责“非难我们‘大跃进’和人民公社，就是非难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。这些非难我们党的总路线的人，是些什么人呢，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，就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。”

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。”（[15] 刘少奇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，红旗，1959（19））在会见外宾时也称赞“我们的跃进，恰恰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上出现的新事物”，其中一些发展比例失调问题“是局部的，暂时的，容易纠正的”。（[16] 刘崇文，陈绍畴。刘少奇年谱（下）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6，463-464 页）

虽然在大跃进运动中，“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，也犯过一些错误。”（[17] 邓小平文选（第二卷）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3，277 页）但是刘少奇具有实事求是的心理水准，在 1961 年大跃进的危害暴露无遗后，他较早地从大跃进运动的亢奋状态中清醒过来，从实践乃至理论上尽可能地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，努力恢复党的八大路线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大跃进运动的破坏性。当然，刘少奇那时对大跃进运动的心态具有不成熟性。他尚未认清“三面红旗”本身的错误，主要是严酷的现实使他理智地放弃了对大跃进运动的幻想，而实事求是、知错必纠的科学态度又使他有意无意地修正了总路线的错误。